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张强 著

司马迁与宗教神话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

司马迁与宗教神话

张 强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4 插页 174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419—6201—5/G·5449

(简精装) 定价: 9.60 元

序 言

董继昌

中国有世界文化名人司马迁，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陕西乃司马迁的故里，这更是陕西人民的光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三秦研究司马迁的学者们组织起来，成立了“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开展有计划的群体性研究，在这司马迁研究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先例。研究会成立后，研究工作迅速铺开，仅两年多的时间，大型工程《史记研究集成》已正式动工，大型电视专题片《司马迁万里行》已开机拍摄，大型丛书《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第一集已顺利完成，这亦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对这些可喜的事功，我感到十分欣慰和由衷的高兴！这里仅就即将付梓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说几句话。

《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共28本，包罗天、地、人、物系统知识，从《史记》百科全书这一广阔的领域内揭示出司马迁与中华文化的密切关系。过去，人们通常赞美司马迁是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或再以“史圣”誉之，这都不足以全面体现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郭沫若先生曾以“功业追尼父”称颂，认为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是一点不假的。事实上，司马迁本来就是以继承孔子而自许的。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

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是为了不辱父命，继承孔子伟业，司马迁便坚定地肩负起效法孔子著《春秋》而写《史记》的崇高使命。对于《春秋》，司马迁不单单看作是一部“史”书，而视之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文成数万，其指万千”，旨意高远、内容丰富的纲领性的文化经典。他的《太史公书》亦绝非一般“记言”“记行”的史官之举措，而是在“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的基础上，要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而这“一家之言”，不仅“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补六艺之不足，较之《春秋》，意欲要突破和超越是非常明显的。

司马迁以孔子之后的文化领袖自许，决心写出胜过《春秋》的《史记》，并未狂言欺世。论《史记》的成就，不管从中国历史长期已行的实践性，或从集文化之大成的广博性和从领风气之先的进步性哪一个方面而言，较其前人，都是后来居上之佼佼者。如以实践而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行之有效的外儒内法的政体，并非是孔子思想的体现，实则以司马迁崇儒而不弃法的思想所构建；上层文化领域内百家竞流的实际，也非孔子一家的独行，而是司马迁“整齐百家”的再现。论其文化知识面的广博，李长之先生誉司马迁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巨著《史记》当然也就是“百科全书”类的宝藏了。《史记》除了囊括孔子所致力于诗、书、礼、乐之外，又融汇百家学说于一炉，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民俗、特别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科技等；而且并非停留于孔子“述而不作”的整理介绍阶段，力求作到“通古今之变”的论述，让人们“原始察终”充分认识其历史源流的发展变化。论其文化

思想的进步性，且不必详列对各科文化的卓识远见，仅就政治上不提倡“克己复礼”，而在总结“承敝通变”的基础上大力颂扬革新进步；经济上不重本抑末，而提倡创造财富发展商品经济；在国家的统一上，不囿于“华夷之分”的狭隘圈子，而提倡华夏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民族大一统的崇高思想；对外不是闭关自守，自我独尊，而是竭力介绍域外物产，让人放眼更广阔的天地。诸如这些思想认识，不仅在两千多年以前是十分杰出的、领先的，即如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亦是闪闪发光，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司马迁是位当之无愧的华夏文化巨人，其文化思想精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真正代表。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的组织和编著者，充分认识到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及其崇高地位，不再囿于史学、文学范围的研究，推而广之，努力开拓新的领域，着眼于多层面全方位的探讨。如此全方位深化司马迁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尤其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充分探讨《史记》的丰富意蕴，总结两千多年的人事盛衰、存亡、成败、得失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借鉴作用；科学评论司马迁的崇高精神及对文化的巨大贡献，让人们为有如此震古烁今的文化巨人而自豪，本身就具有产生爱国主义情操的强烈感染力；重视阐明司马迁对华夏文化的丰功伟绩及进步思想，既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非常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所收集的各家的论著，不强求观点的一致，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治学精神。学术研究要发展，不可能没有争议，更何况对司马迁展开全方位

的研究，确属开创性的事业，更需要各抒己见，互相争鸣。司马迁竭尽毕生精力所撰写的《史记》，总结了中华二千余年的古代文明，是第一部集华夏文化大成的百科全书，其博大精深的內容，需要集中更多人的智慧，花更多精力来不断研究。因此，我热切希望更多的学者和海内外热爱华夏文化的仁人志士，投身于司马迁的研究，为弘扬华夏文化做出贡献。也希望以此为契机，继续前进，把陕西逐步建设成司马迁研究基地。

1994年国庆前夕于西安

五吕同慨斯为代矣，善善辞辨果能随往丛，县伯想知人令
著华文，半史于固再下，分供高崇其处仰遵大吕伯升文固中权
式全面恩定于期善，如游伯海研代代授，之飞而垂，决得伯固
，天令伯升改革史迹，决得伯五吕伯升新史式全出成，核得伯升
总，意意富丰伯《史记》付得代矣。义意突更伯陈弱言富其代
奔叔，锦登贵定伯夫爵，娘娘，二存，登登事人伯平定于西吕
崇伯五吕伯升新史式，出并登登知得言其好史伯升得伯天令伯
升文的令叔古藏出成言衣伯人升，精质大吕伯升文叔又軒靜高
重，代渠恩恩伯得得又主国晏主言言其其良本，秦自而人吕
伯人勇伯固，恩恩史史又得得史丰伯升文夏半叔五吕伯固得野
并静义主会并干俱言常非出，翻翻伯升文卷得半中得得伯升五
。好得伯即文
案各伯集得伯，特文伯“道在百，即半案百”得得并丛
半。軒靜半得伯五吕伯丁史得史友，登一伯点取宋能不，善伯伯
伯式全并恩五吕伯叔得同更，好半言得得伯不，虽史更得得宋

目 录

导 论 司马迁与史官文化及宗教

神话 [1]

1. 史官文化对巫官文化的覆盖 [3]

2. 史官文化对宗教神话的切入 [10]

3. 史官文化对巫官文化的全面 胜利 [16]

一 司马迁与原始宗教神话 [21]

1. 司马迁的宗教观 [23]

2. 司马迁的天命观 [42]

3. 祖先崇拜与上帝信仰 [61]

二 司马迁对神话传说的关注 [82]

1. 实地考察：司马迁对神话传 说的收集与整理 [83]

2. 先秦典籍：《史记》神话传 说的另一重要来源 [100]

3. 司马迁与谶纬神学 [116]

录

三 历史与神话传说 [139]

1. 司马迁：系统研究史前史第

一人 [140]

2. 神话传说与司马迁的历史统

一观 [153]

3. 《五帝本纪》贯串着华夏各部落

大融合的思想 [168]

历史与神话传说 [139]

四 司马迁对道教文化起源的发微

..... [186]

1. 秦汉：道教形成的重要阶段 [187]

2. 长生不死的追求 [207]

..... [207]

五 宗教神话对司马迁浪漫

气质的作用 [228]

1. 《史记》的浪漫主义文化氛围 [229]

2. 司马迁浪漫精神与英雄史观的
契合 [235]

3. 壮游及宗教神话对司马迁浪漫
主义情怀的培养 [239]

..... [239]

后 记 [246]

..... [246]

..... [246]

..... [246]

导论

司马迁与史官文化及宗教神话

一个民族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她的历史和她的文化。而悠久的民族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孕育而成的，它的源头则必须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史前史时期。

神话是历史与文化的结晶体，在现代人的意识中，经幻想、联想和想象而成的神话代表着人的本质力量向自然发起了挑战。在热烈、浪漫而又绮丽的神话中，无论是统一各部族的黄帝，还是勇治洪水的大禹，在他们的搏击中都成功地映现着人的历史、人的文化。但必须指出的是，先民们并没有如此明确的自觉意识，他们的追求是非理性的。他们深切关注的是大自然——这一异己的外部力量具有的不可期预、不可捉摸、不可控制的神奇意义，在苦苦的探索中企图以歪曲了的世界表象对世界乃至宇宙作合乎情理的解

释。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主宰万物的神便诞生了。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神话是原始宗教乃至整个宗教生成的土壤，前者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是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②后者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们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③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神话与宗教的论述中，不难发现神话与宗教处于异质同构的矛盾同一体中，它们之间的互为表里，一方面神话为原始宗教的雏形——拜物教输送着血液；另一方面，原始宗教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作用下，在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④的时候，则“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⑤即原始宗教在为丰富神话贡献着力量。在这一双向流动互为补充中神话与原始宗教便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宗教是神话的产物，前万物有灵向万物有灵过渡的历史亦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其中原始宗教与神话的血缘关系自不待言。应该看到的是，神话作为史前史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呢？如果我们不抱任何成见的话，则必须承认主要是神坛上的巫师充当了这一角色。进而言之，巫师在梳理已有的神话系统包括丰富和扩展所起的关系作用是传承，即巫师承担着史的责任。这样，当巫师的后学——史官成长壮大起来的时候，由于巫、史

①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③④⑤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第355页。

之间的天然联系，在向注重人文社会价值的位移中，其历史意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宗教意识的制约。换句话说，当史官把他们的触觉伸向神话时，也在或强或弱地确立着神的观念世界。巫史之间的传承表明宗教信仰是历史意识的构成，史官的历史追求摆脱不了宗教意识的控制，原始宗教文化因子积淀在史官的意识之中，则时而会由深层浮游到表层干预着他们的史述。因此，当史官直面历史时其神经触觉必然地为宗教——神话这一紧密的结合体所包裹。

1. 史官文化对巫官文化的覆盖

打破现有文化秩序进行历史文化建构的是史官。史官出现于殷商，大量的出土的甲骨卜辞可作充分的证明。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也。”又云：“事，职也。从史”。许慎的解释是符合“史”出现的情况的，就是说，“史”是记事之官。问题是“史”职掌之事为何事？这是我们必须澄清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说国家的大事主要有祭祀和军事行动两类，这其中，“史”扮演着重要角色。

“史”有大（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女史等职之分，分工之细，这当然是“史”在发展中造成的。从总体上说，众史分工及侧重之事虽不同，但都在执行“祀与戎”之事，如《周礼·春官·宗伯》云：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

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事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谏。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算，执其礼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莫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谏。

大史职掌的“国之大事”是祭祀和“大师”。所谓“大师者，大起军师也。”^①小史职能在于“佐大史”。众史名称不同，行事大体相当。

筮人之职“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②所谓“筮”即筮，指用蓍草占卜。占人之职“掌占龟”，“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③卜师之职“掌开龟之四兆”，“凡卜事，眈高，扬火以作龟，致其墨。凡卜，辨龟之上下左右阴阳，以授命龟者，而诏相之”。^④郑注：“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筮人、占人、卜师皆为巫祝不同之称，

①《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卷二十六。

②③《周礼·春官·宗伯》。

④《周礼·春官·宗伯》。

史亦包含其中，史最初应该是巫祝的一部分。大祭祀，与执事卜日”，大史在行巫祝之事。郑注：“执事，大卜之属。与之者当视墨。”疏曰：“知执事，大卜之属者。大卜，掌卜事。故知执事是大卜言之属者，兼有卜师及卜人，知当视墨者。按，占人云：‘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彼言史者即此大史。故知当视墨。”大史在祭祀之中其职能与大卜同。故《礼记·玉藻》云：“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礼记·礼运》云：“王前巫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一句话，史诞生于巫的母体之中，即史是由巫脱胎而来的。

史最初是神职人员，史关心的是“天”，所行之事与巫祝同。问题是当史一变而为史官逐步由巫祝中分离出来，其意义与意味自然与巫祝不同了。周代“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大史之责在于据文献行法治，有监察之责。此外，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的职掌都与此有关。《周礼·春官·宗伯》云：“小史，掌邦国之志。莫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佐大史。……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巾车。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据此，史之职除有监察之责外，更重要的是

职掌文献和作礼法之书，其地位十分显要。故王国维指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卑地要可知矣。”^①

必须指出的是，周代虽表现为巫、史分离的要求，但是，史出于巫，史官之职掌依旧部分地承担巫之职能，《国语·楚语下》有“家为巫史”之语，“巫史”并称不仅仅说明巫为史之源，而且表明史官一时还无法摆脱巫（祝）的控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史学才算彻底从巫文化的阴影中走出，不过司马迁还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②

《周易》是卜筮之书，其卦爻辞成型于孔子之前，大约是西周时候的作品。《周礼》是周代礼乐的经典文献，系统地叙述了西周的礼乐文化建制及机构，大宗伯总领“天神、人鬼、地示之礼”，（《周礼·春官·宗伯》）其隶属有以大司乐为首的乐官系统，以大卜为首的卜官系统，以大祝为首的祝官系统，以大史为首的史官系统。^③四大系统同为西周礼乐文化的执行机构。根据《周礼·春官·宗伯》的语意指涉，大宗伯的职掌范围决定了大宗伯在礼乐方面行使着巫官的职能，大宗伯实际上是巫官文化的总头目，大宗伯职务本身的标志就是巫官。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司乐、卜、祝、史职掌之间的互通亦充分表明他们是巫官系统的四大执行机构，前面我们论述史出于巫，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

② 司马迁《报任安书》。

③ 郭东明《先秦史官文化及其文学意蕴》一文亦有类似的想法，他指出，“在大宗伯总负责下，构成了以大史为首的史官，以大司乐为首的乐官，以大卜为首的卜官，以大祝为首的巫官四大机构，构成了时代精神文化和艺术文化的主干。”《文史哲》1993年第2期。

巫、史不分就是明证。据此，应该承认《周易》是巫文化的产物，该作出于巫官之手是没问题的。

从巫文化到巫官文化是一量变的过程，其释放的能量在量变之中积蓄着质变的力量。《周易·巽·九二》云：“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意思是，病人卧床不起，史巫降神祭祀，攘灾驱鬼，忙碌不停。巫是这里的主角，巫本身的职能在于司祭降神，但巫官文化的发达以及巫、史分职，各掌祭祀事务一端，故巫专门负责降神，史专门司祭。“史巫”并称，将史冠于巫前，昭示着史从巫中分离出来的迹象。

巫文化向巫官文化衍化的标志是在观念世界中强化历史意识。《周易》作为巫官文化的最高成就，除了“幽赞于神明”（《周易·说卦》）之外，便是言“变”，如《周易·系辞下》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追究着“天道”、“人道”、“地道”，^①故《周易》的神道观中历史意识十分强烈。神、人杂糅是《周易》的特征，撕去其神秘的面纱便可见《周易》所反映的上古社会。古史辨派的杰出代表顾颉刚先生据殷商甲骨文考辨《周易》，发现《周易》保存有大量的商周史料。^②顾颉刚、郭沫若二位先生的研究表明，《周易》作为巫官文化的成果和存在，在巫的本职——降神尊天之中已萌发出强烈的史学意识，巫、史之职的分离在巫官文化中掺杂着巫文化和史官文化的不同追求。两者之间的斗争和彼消此长预示着史官文化的因子已悄然诞生于母体——巫官文化之中。正是因为如此，在史

① 《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② 参见顾颉刚有关论述，详见《商周间的神权政治》等论著，《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

官文化艰难的跋涉之中巫文化作为潜在文化因子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第一次重整传统文化秩序的是史官，从时间上看，相对集中于有周一代。“六经皆史”，^①先秦的智识阶层全面地以史官文化覆盖巫官文化，史官文化的衍进与巫官文化的退却，不是留下一个真空地带，而是以覆盖的形式在接触面上呈胶粘状态。“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系辞上》）我们无法确定其“变”是言人事还是言天道，但《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据此，《周易》表面上是在事鬼敬神，但实际上是把人立于中心的位置加以突出的，不容置否，它对人事的重视又是披着巫官文化的外衣进行的。

史官文化诞生于巫官文化母体之中，并对巫官文化的覆盖不是一次完成的。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②孔子从《易》中发现的是人事。庄子云：“《易》以道阴阳。”^③庄子注重的是天道。两者间的对立无疑在暗示着重人的史官文化与重天的巫官文化处于激烈的碰撞之中。真正标志着史官文化完全覆盖巫官文化的是在汉代，“汉初说《易》者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④这其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本意在于“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⑤天道与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论语·述而》。

③ 《庄子·天下》。

④ 皮锡瑞《经学通论》。

⑤ 《史记·太史公自序》。